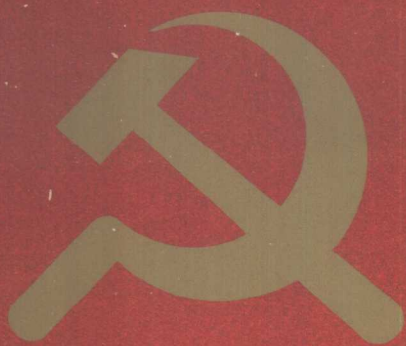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人物傳

凍原

精選本 7

編委會主任 李力安

主編 陳志凌

人民日報出版社 中央文獻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

第七卷·政治经济建设篇(上)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编委会主任:李力安

主 编:陈志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顾问

习仲勋	肖克	杨成武	马文瑞	邓力群
段君毅	赵南起	李葆华	穆青	吴仪
邵华泽	刘纪原	徐光春		

编委会副主任

李铁林	刘云山	徐文伯	陈虹	桂晓风
热地	舒惠国	林开钦	何光晔	朱新民
朱佳木	王重农	尚文	赵培义	李岩
魏久明	王洪			

副主编

郑建英	杨瑞广	姜华宣	吴殿尧
-----	-----	-----	-----

编委

马洪武	王良	王性初	王永仁	邓斌
冯树成	吕芳文	阎景堂	朱成贵	朱敏彦
李宏塔	杨世兰	吴家林	陈弘君	高三山
郭洛夫	周垂远	黄玲	黄瑶	蒋建农
程韶韵	翟作君	戴知贤	刘勉玉	张广立
郑洪泉	雷厉	张国良	温厚文	贺扬
管景臣	宋毅军	赵俊清	宋霖	陈瑞云
蒋伯英	王江松			

目 录

政治经济建设篇(上)

马文瑞.....	(1)
王稼祥	(33)
王鹤寿	(74)
邓子恢.....	(131)
叶季壮.....	(192)
刘澜波.....	(213)
孙志远.....	(257)
李六如.....	(297)
李先念.....	(359)
李富春.....	(420)
李维汉.....	(504)
李葆华.....	(550)
杨秀峰.....	(596)
杨静仁.....	(648)
何长工.....	(678)

余秋里	(735)
谷 牧	(808)
沙千里	(881)
张闻天	(915)
张奚若	(980)
张鼎丞	(997)
张霖之	(1043)
陈 郁	(1076)
陈正人	(1106)

马文瑞

贺天中 曹建平

编撰者话 马文瑞,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参与创造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新中国劳动工资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他一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自觉抵制“左”的或“右”的错误。他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积极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革命一生,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马文瑞1912年11月4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马家阳湾村。祖父马沼兰、父亲马彦举以农为主、兼开商店。有一百多垧山地和羊群、牛、驴,雇佣两个长工,还在周家砭镇开了一个“公盛源”商店。马文瑞六七岁时,家里连遭天灾人祸,家道衰落,父、叔分家。父亲染上了大烟瘾,糟蹋了一半家业。家里只能靠兄长马文采、马文彬种六七十垧山地维持温饱。

马文瑞从儿时起祖父就教他认字,叔叔、大哥,也是他的老师。有此条件,他在放羊时就自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之类的启蒙读物。九岁时,他入学校读书。先入马家坪小学,后转入吴家塌小

学。他入小学以后,从书本上知道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政府的罪行,产生了强烈的反帝和反封建政府的意识。在吴家塌小学上三年级时,阅读到《民报》^①,并看了一些其他政治书籍,由此,开始了解了“辛亥革命”,知道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主张。在小学期间他组织过读报小组,主动到群众中宣传反封建,反对妇女缠足等。

1925年,马文瑞升入周家崕高小。由于刻苦读书,他在高小期间各门课程考试都名列第一。1926年,他在高小二年级时,初夏的一天傍晚,几年不见的表兄冯文江来校找他。过去马文瑞和表兄的感情就很好,这次见面后,马文瑞讲述了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看法后说:我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拥护国民革命,决定参加国民党,已经填过表了。冯文江则讲述了农民运动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毛泽东的农运主张以及广东和湖南农运发展情况。冯最后说,他已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谈话对马文瑞触动很大。此后不久,就和几名进步同学对农民贫苦生活状况进行了社会调查,下决心组织农民协会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周家崕小学的图书馆里,他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制度浅说》、《共产主义 A、B、C》、《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史》、《独秀文存》、《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他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由“三民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②

1926年秋,共产党员师俊伟来周家崕高小找马文瑞。了解了马文瑞从事革命性社会活动的情况。经过多次接触交谈,师先是带来《共进》杂志,以后又带来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入团须知》,叫他秘密阅读。几天后,师问马是否愿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坚定地表示同意。1926年10月,马文瑞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家崕小学当时还没建立党团组织,马文瑞作为第一名团员,除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先进思想以外,先后发展了五名团员,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1927年

①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1908年冬被日本政府封禁,1910年初在日本又秘密印行了两期后停刊。共出了26号。

② 中组部档案:马文瑞自传、忽培元著《群山》第44页。

初,他当选为学生会主席,还担任了学生讲演会主席,为共青团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在镇上讲演,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有一次组织了几百人去同一个以权欺人、贪污公款、敲榨百姓的张姓分区区长进行斗争。他高小毕业后,于1927年7月到8月参加了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暑期班学习,并拟投考该校。但由于绥师是陕北共产党人活动的大本营,1927年被反运军阀井岳秀解散。这样,在1928年他就考入了米脂县三民主义第二中学。报考的有300多人,只录取50人,他是第一名。他入学后积极参加了声讨“五卅”惨案的大游行、冲天主教堂、到县政府请愿等。不久二中被弹压解散,他只学了半年就辍学了。192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在南丰寨古庙上召开陕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陕北特别工作委员会,选省委派来的杜衡当书记。杜衡因麻痹大意被捕,将特委文件丢在米脂县委负责人景仰山处。特委委员杨国栋等将取文件的重任交给了马文瑞。马文瑞剃了光头,穿上光板破羊皮袄,装作进城赶集的混进了城,到景仰山处取了文件,装入口袋,又大摇大摆地出城。在城门口,被哨兵喝住,他装作哑巴不说话,只是手指肩头上的小褡裢。岗上小军官一掏褡裢,见是中药,无值钱货,就放他走了。出城后,他专捡山间小路,不吃不喝,一口气急行一百多里,把文件交到杨国栋手里。杨国栋、冯文江赞叹不已。冯文江说:“文瑞,你已参加了特委的工作,干脆离开学校,做实际工作吧”。杨国栋也积极赞同。于是马文瑞参加了地下党团工作。

二

马文瑞于1928年秋离开学校,担任绥德西区团委书记。由于党的组织遭到破坏陷于瘫痪,找不到团的上级组织和县团委领导,马文瑞便独自开展工作。他穿上农民穿的烂皮袄,白天躲在庄稼地里和窑洞中同一些团支书商讨工作,夜里就在长工和光棍汉的窑洞里找团员开会。他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工作,清除了动摇变节分子,启发团员提高觉

悟,并发展了一批优秀青年农民入团。有一天他去中共绥德县委所在地李银家沟,见到了新来的县委书记白乐亭。白是绥师首届毕业生,1924年投身革命,比马文瑞大十几岁,有较为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马文瑞找到了可以信赖的领导,非常高兴。十几天后,白乐亭找他研究工作。白说:“全县各区仍然坚持开展团的工作的,只有你们西区这一片,其它地方都停顿下来了”“你们的团县委负责人也逃跑了”。白严肃地说:“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你能够坚持独立工作,使西区团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艰难困苦之中,表现了勇敢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事业忠诚。我有个想法,想请你把团县委书记这副担子挑起来”。不久,在县共青团代表大会上马文瑞当选为团县委书记,同时转为共产党员(介绍人为白乐亭、周发源)并任中共绥德县县委常委,成为绥德地区党团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①

1929年4、5月间,共青团在米脂县城召开代表会议,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刘志丹出席。马文瑞第一次见到刘志丹。一天晚饭后,当他与刘志丹在米脂城外的田野散步谈绥德情况时说:时下,陕北大旱,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野,但反动军阀、官府和地主豪绅照旧重税和高利盘剥,农民陷入了生活绝境。如果党组织能趁此机会组织他们与军阀、官府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一定会一呼百应。刘志丹立即表示同意。^②马文瑞回绥德后与胡永华等县委领导议定,组织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灾民进城要救济粮款的斗争。当即以县党委和县团委的名义用“鸡毛传笺”的办法通知各区派党团员干部率领农民进城。1929年7月9日晨绥德各区的四五千农民背着预备装粮的口袋,手提棍棒从四面八方涌来。绥德师范的党团员白如冰、白寿康、贺晋年、吴志渊、李光白(四师团委副书记)等也化妆成农民挤在农民队伍中进行工作。由于大批农民进城的异常状况,守城的国民党部队急忙把城门关了。他就鼓动饥民砸开各个城门。城内守军营长张建民命令朝天鸣枪。农民不管,冲进城去涌向政府,向县长要救济粮、救济款。县长跳后墙跑了,饥民就冲

^① 《群山》第116页。

^② 《群山》第156页。

入大户安文清家的大门，未找到人、粮，又冲进蛋粉厂愤怒地抢蛋粉和捣毁设备。那个营长见农民不散，与逃在城外的县长商定，发钱给饥民。马文瑞经与各区负责同志商议认为，当局已发救济款，农民得到了实惠，决定停止行动。这次绥德饥民斗争，是共产党在陕北领导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斗争。在其影响下，延川数千农民冲进县政府拒交“皇粮”，安塞数千农民冲进县政府向县长要饭吃；米脂东区组成声势浩大的“要吃会”、“请愿团”，如此等等，使大革命失败后沉寂下来的陕北又开始红火起来。

1930年，安定县（今子长县）北区区委书记任广盛被反动县长逼死。8月马文瑞调到北区任区委书记。几个月后立三路线祸及陕北，陕西省委提出要“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新任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把党、团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搞地方暴动”、“武装起义”。到处贴标语、撒传单，搞群众集会，公开喊打倒国民党、组织红军、成立苏维埃政府。结果只是虚张声势、毫无所得，反而把党、团组织暴露了，国民党得以到处捉人。县委书记冯文江身份暴露，只得离开安定，其他两名县委委员也跑了。各区党团组织活动停顿。中共在井岳秀部精心经营潜伏的神木高志清骑兵师手枪连，奉命仓促起义而惨败。马文瑞认为把弱小的革命队伍亮给敌人，去作力不从心的蠢事，后果不堪设想，因而未执行省委指示。他只是夜间派人出去贴贴标语，党团组织依然是开展秘密活动，所以，安定县北区党团组织、外围群众组织完好无损。1931年1月陕北特委决定，由马文瑞任中共安定县委书记，组成新县委。他在县委会议上果断地提出：“全县各级党团组织以秘密活动为主”，并允许党的基层干部以公民身份担任国民党地方负责人。当时全县党团员合计有三百多人，为了防止出现叛变，他组织清洗了一些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清理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特委派人来安定巡视时，安定县已经改变了斗争方针，不仅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四个区二十多个中共支部的工作还有发展。接着，上级决定由马文瑞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兼陕北特委委员，仍留安定工作。

1930年冬，陕北特委派阎红彦、白锡林过黄河到山西组建革命武装。阎、白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组建了一支一百多人的“中国工农

红军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山西省反动当局派万余人的队伍进行围剿。为此，晋西游击队决定突围过河西去陕北活动，到黄河岸边只剩下三四十人，夜间淌过黄河后，队伍疲惫不堪，阎红彦到处寻找地方中共组织。1931年8月的一个夜晚，在安定县北区的任家砭见到了马文瑞等。阎红彦向县委汇报时，交了该队三十多人的名单，说都是中共党员，装备也好，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子弹也足。马文瑞听了很高兴，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县委对游击队除解决一些供应问题外，还帮助他们有条件地收编了被山西当局赶过河来保护烟贩子的保镖队。县委还动员了三十多名条件好的当地青年农民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扩大到一百多人。经过一个时期武装斗争，游击队在陕甘边地区开辟了红色游击区，发展成为步骑三百多人的一支武装，后来，同刘志丹领导的民间武装混合组成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此基础上，于1932年冬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934年，陕北特委派马文瑞到杨虎城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驻军谷连防骑兵旅搞兵运。他到三边后找到了打入杨部的共产党员薛毓瑞等十余人，将他们组织成支部，并指定由薛毓瑞、王治歧、师发直为负责人。不久，杨虎城命令谷连防旅开进西安整编。当时马文瑞本可以返回特委，但考虑到走后会使命功尽弃，于是毅然决定跟随部队去西安。三边到庆阳是蛮荒不毛之地，遍地沙丘，马文瑞跟着部队走了五六天。到达庆阳时，部队停下来进行短期整训。他冒险化妆打入谷旅，住在薛毓瑞连。庆阳北距红二十六军所在地的南梁仅二三百里，去西安也只有四五百里，再开拔就没有办法了。马文瑞当机立断，在一个黑夜，命令师发直率二十多人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来，投奔南梁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

1935年3月，马文瑞受陕甘特委委派到陕甘边东区开辟根据地。

马文瑞带领胡自禄（陕甘边苏区经济部长）、张彦福（原华池县赤卫队队长）和许克昌等及三十多人的一支警卫队开入东区，工作范围主要是甘泉、宜川及三谷川一带。马文瑞等进入新区以后，首先是发动群众。他们在红四十二师骑兵团的配合下，在广大农村普遍组织农会，建立赤卫军、游击队和游击小组，打击反动势力、摧毁保甲组织。赤川县北池子有一地主，家里有两人为国民党作侦探，马文瑞亲自带警卫队将

其捉住镇压。宜川有个土寨子,住了很多士绅劣豪,由民团把守,时常出来祸害百姓。马文瑞率义勇军、赤卫队和扛着红缨枪、镢头、锄头的两千多人的队伍,铲平了这个土寨子。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他们创建了东经黄河西岸,南至韩城以北,西到洛川一带纵横数十里,包括赤川县和红泉县大部分地区的新根据地,成为陕甘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开辟的地区扩展、游击武装的壮大,成立了红泉(甘泉)、赤川(宜川)两个县的革命委员会。在红色政权领导下,发动贫雇农组织贫农团、登记分配土地,进行土地革命。在武装建设方面,把在红枪会基础上组成的义勇军改编为工农革命游击队,最后改为独立营,有三百多人枪。

在建立两县红色政权之后,1935年2月5日,在临镇召开大会,成立了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马文瑞当选为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1935年,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某些负责人,打着“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名义,夺了西北中共的领导权,并开展“肃反”运动,把刘志丹、马文瑞等抓了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地方县以上干部无一幸免,二百多人惨遭杀害。

1935年冬中央红军来到西北。张明科、刘锦瑞、龚逢春在吴起镇找到了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等人被捕情况。毛泽东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候中央处理”,同时派王首道、李涛、刘向三、贾拓夫去瓦窑堡,代表中央接管了保卫局,又派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到瓦窑堡审查陕北肃反。毛泽东、周恩来认为“肃反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指示立即把关押的人全放了。这样,刘志丹、马文瑞等才得以幸免于难。^①

马文瑞被关押二十多天,释放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找他谈话。周恩来亲切地说:“马文瑞同志,把你们整错了”,“我听说了,你和许多同志在陕北搞武装,创造苏区有贡献,作了很多艰苦工作,这些情况中央都了解”。^②最后,周恩来要他顾大局向前看,并问他愿意到哪

^① 《马文瑞回忆录》第90页。

^② 《马文瑞回忆录》第91页。

里工作。

马文瑞被关押后陕甘东地区人民不稳、谣言四起,时任陕甘省委书记的朱理治专门为此来中央汇报,说马文瑞在那个地区威信很高,提出要他去安民。周恩来又找马文瑞谈话,风趣地说:“文瑞同志,你辛苦一趟吧,你去了见了群众随便唠一唠,让群众看一看你‘马主席’还平平安安,人家也就放心了”。^① 马文瑞去后,经过反复宣传,安抚了群众,消除了恐慌。一些离散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又重新组织起来,情绪高涨地投入到支援红军和抗日救国的斗争中。

平反之后,马文瑞的工作几经变动。1935年冬任陕北省委^② 秘书长,1936年7—8月担任陕北安塞东北军工委书记。1937年春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③ 学习。当年6月调任陕北西地区党委书记,在这里与孙铭结为百年伉俪。10月又调往陕甘宁分区,当选为分区党委书记。不久,任陇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2年又兼任三八五旅政委。

陇东地区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军阀、地主、官僚的压榨剥削,抗战初期生活十分贫困。马文瑞到陇东后,提出首先要发展生产,改善生存条件。他领导党政干部组织动员群众大量种植小麦。在生产组织形式上,他提倡组织变工队,进行互助合作。几年工夫,就做到了粮食自给有余,成为陕甘宁边区一个重要粮食产地,延安吃的细粮有许多是从陇东运去的。

1942年,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马文瑞等地委、专署领导马上进行了部署。首先是组织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大量开荒种地,还广泛地开展劳动竞赛。开垦的荒地,当年就收获了大量粮食,有的单位还自己种菜、养猪和纺织布。大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陇东在发展经济上的一个成功创举,是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毛驴运盐队。由乡长、区长甚至县长带队,将三边的盐运往环县城关、庆阳、西

^① 《群山》第431页。

^② 陕北省和陕甘宁边区都是我党临时区划,不是民国政府省区建制。

^③ 原名红军大学,37年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

华池等地,短期内就运盐六百多万斤。同时,还开展集市贸易,用盐换取边区极缺的纸张布匹,远销延安等地区。为了领导这一工作,地区成立了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和光华商店,通过商贸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和物质匮乏。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奖励了领导生产成绩优良的干部,毛泽东亲笔给马文瑞题词:“密切联系群众”^①。

文化教育落后是边区的普遍问题,陇东尤为突出。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庆阳县,文盲也在90%以上。马文瑞要求各县至少在县城办一所高等小学,每个区力争办一所小学,还鼓励私人办学。经过全区上下几年努力,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仅庆阳县就有了公立小学10所,私立小学17所。在此基础上,马文瑞又创办了陇东中学并兼任校长。马文瑞给毛泽东写信请他题写校名。毛泽东欣然题写“陇东中学”的校名,朱德和刘少奇也题了词。^②

陇东在与国民党进行的反“摩擦”斗争中也不断地取得胜利。马文瑞对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在敌人磨刀霍霍的情况下自己放下武器。他召开地委会议,强调要划清阶级阵线,要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阶级教育,并叫宣传部门编印和下发了毛泽东有关阶级分析的一系列论述。由于他头脑清醒,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精神,对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反“摩擦”斗争中节节胜利,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2年刚过元旦,马文瑞接到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策马来到延安。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他直接聆听毛泽东作整顿“三风”的报告,开始投入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各方负责干部266人,旁听的209人。会议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实际上是在党中央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出席了会议。

^① 《马文瑞回忆录》第119页。

^② 《马文瑞回忆录》第121页。

经过近三个月的会议,大家肯定了陕北、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工农武装斗争的正确性,肯定了刘志丹、谢子长在建立革命根据地中执行的正确路线,认为他们对西北革命的贡献功不可没。会议批判了郭洪涛、朱理治执行王明“左”倾路线、肃反扩大化给西北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马文瑞在1942年11月30日的发言中,回顾了西北党和西北根据地武装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肯定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陕甘的土地革命斗争,批评了党内少数同志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在其影响下所犯的错误。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中心工作和条块领导的关系问题,指出上边条条对地方有关部门的直接部署工作影响了地方的中心工作。

会议以后,马文瑞回陇东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久,党中央将准备参加“七大”的一些代表编为中央党校第三、第六两个支队,1944年4月马文瑞第二次入党校学习并任六支队支部书记。

1944年9月,马文瑞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春任西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他一上任,就开始处理康生搞“抢救运动”炮制的大量冤假错案。他任西北局甄别平反领导小组组长,抽调干部对“被抢救者”逐个进行复查,重新作出结论,错了就予以平反,并代表组织进行赔礼道歉,解脱了大批干部,其中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甄别平反历时一年余,“七大”以后才告结束。除了甄别平反,他还要处理组织工作方面的一些大事如解决乌兰夫参加“七大”的问题等。1945年4~6月马文瑞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党的“七大”。

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侵占延安的前一天傍晚,彭德怀、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贾拓夫、刘景范七人去毛泽东的窑洞向他告别。大家看到毛泽东依然在挥笔疾书,都为之震惊。在短暂谈话中毛泽东谈了主动放弃延安的战略方针。和毛泽东告别以后,马文瑞即随彭德怀连夜赶往青化砭,去打伏击战。

当时西北局的部署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前线服务”。西北局领导兵分两路。一部分留守地方。习仲勋、贾拓夫和马文瑞则跟随彭德怀和王震随军领导支前工作。他们的任务是,部队打到哪里,就把粮食饲草送到哪里,保证有足够的民夫担架把伤员抬到医院,还要保证几

万大军的服装换季问题。除此之外,还为部队作战提供咨询意见。如解放陇东环县时,彭德怀对马文瑞说,你是老陇东了,环县情况你熟悉,你看这个仗该如何打?他当即介绍了环县的城墙建筑、地势等方面情况,并提出了围城、炸开城门进行巷战的作战参考意见,受到彭德怀的重视。

1948年4月,解放军收复延安,西北野战军向陕西关中地区挺进,急需大批干部。彭德怀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西北局抽调干部迟缓,有的质量不合格。习仲勋对此很着急,找马文瑞商量解决办法。马文瑞说,解决这个矛盾,得从调集、培训大批干部入手。随后,马文瑞就带组织部干部把行李搬到党校,亲自主持培训和选拔优秀干部的工作,调出去的每个人都由他亲自审定。西北党校每培训一批干部,他都亲自去讲话和授课。他提出的口号时,新区需要多少干部,我们就抽调培训配备多少干部。这样,几个月就把西北五省主要干部派齐了,彭德怀很满意。

三

194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进驻西安。马文瑞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他和组织部的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各级机关中“组织多、官多、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其结果是文山会海、事务繁冗,误事不少。经研究核实后,写成调查报告,经习仲勋同意,以西北局名义报呈中共中央。毛泽东很重视,当即批转各地要求注意此事。

1952年底,中央任命马文瑞为西北局副书记,同时兼任组织部长、西北党校校长、西北局纪检委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4年2月,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处理了高岗反党问题。西北局由马明方、马文瑞两人参加了会议。会后在西安先后召开了西北局全委扩大会议和有两三千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两次会议都是马文瑞作的传达报告,并领导学习讨论。大

家都表示拥护中央精神。1954年6月中央决定撤消大区。马文瑞暂留西安处理西北局善后事宜。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马文瑞为劳动部部长。

马文瑞到任后学习了中共中央对劳动工资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劳动部门的职责任务。劳动部于1955年5、6月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局长会议。马文瑞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劳动部在工资、劳动力调配、技术工人的培养训练、劳动保护、锅炉安全检查五个方面的职责任务。会后,劳动部党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局长会议的报告》。中央批发了这个报告。为了进一步明确劳动部及地方劳动部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1956年劳动部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组织简则》、《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局(厅)组织通则》。同年9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这两个文件。

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全国统一的全面的工资改革。工资的根本问题一个是水平,一个是制度。在1956年初这两个问题都很突出。从工资水平来说,全国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1954年提高了12.5%,1955年提高10%。但从1953年到1955年却没有全面调整工资,以致1954年平均工资只增长3.1%,1955年只增长2.9%,远远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加之,消费品价格有所提高,部分职工实际工资有些下降,职工群众颇有怨言。从工资制度来说,当时全国企业职工实行的是与基本生活资料物价挂钩的工资制,由于物价趋于稳定,已没有必要再实行这种办法。而且,过去的工资改革是以大区为主分别进行的,地区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以至各类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都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因此,进行全国性工资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极为必要。

工资改革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以国务院名义进行的。劳动部作为国务院统一管理全国工资工作的政府机构,肩负其全部业务。1956年3、4月份劳动部召开全国工资工作会议,讨论工资改革方案。周恩来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到会,讲了工资改革的方针政策。马文瑞在发言和报告中进一步说明了中央的政策精神和制定工资改革方案的政策原则以及具体要求。他特别强调:“工资增长必须和劳动生